



北航高研院·治道文丛

道统与治体

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任
锋◎著

告别意识形态激情，养成谦逊而开放的心智习性。聆听来自传统的教诲与启示，再续道统，讲求治体，透过与古圣先贤、西哲大智的宪制会话，为现代中国的共同体建构提供资粮，推进文明精神的转化更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航高研院·治道

道统与治体

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任 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 任锋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17-2077-1

I. ①道… II. ①任… III. ①政治学—文集②史学—文集

IV. ①D0-53 ②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500 号

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7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380千字

印张：15.25

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网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采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世思想中的政治体制论”

(项目号: 07CZZ022) 项目成果之一

治道文丛 序

广川董子云：“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中国之治道，载在五经；百家言尤其儒家之立论，莫不本乎五经，中国治道因此而日新、日日新；依循此道，中国持续生长、扩展，而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猗欤盛欤，吾国吾民！

二十世纪初，国势陵替，士心思变，竞逐西方新学，中学之统衰微。尤其是中国治道，少人研习。过去几十年来，依凭先人遗留之文明，借助西方传来之技术，中国再度崛起，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然而，已经富裕的中国如何形成优良治理秩序？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中国现代优良秩序之生成、维系，不能不由千古一贯之中国之道。晚近学界、政界，已有此文化的自觉、中国治道之自觉，而有回向大道之努力。

本丛书应此运而生。所邀作者不限年资中外，要在对中国治道有所体认，又有西学功底、普世视野。所收书目不拘一格，或为专著，或为文集，或为译著，要在学有根底，言之有物。所论议题无所范围，或阐释五经义理，或深究儒学奥蕴，或寻绎观念、制度之演进，要在有所发明，有裨益于明道、行道。

编者唯愿与二三君子强勉学问，以求闻见博而知益明；编者亦祈当世精英于各个领域强勉行道，或可德日起而大有功。

蒲城姚中秋谨识于癸巳秋杪

从乌托邦反思到宪制会话

1998年夏，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去往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眼前的这本文集，便是自那时起我在学思探索中收获的一些片断。

记得赴港前，与历史系的师长交流，明确了未来求学的一些关键，比如注重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吸收。于我而言，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适逢香港回归不久，可以现场感受“一国两制”这个创新实验的展开。

初初到港，犹能感觉到萦绕此间的一些隔膜和猜疑。有同学想象我们的中央“特派”身份，几有异类之感。媒体上的国旗焚烧争议、非港生子女的永久居留权诉讼、非典（SARS）之年的冷寂与激情，都让我这个大陆人有了直观的体会。而东西方资讯的丰富与复杂、海外华人混融传统与现代性的文明活力，也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心思汹涌。

隔了浅浅的清水湾，我的读书生活暂时远离了那片大陆，无论“下岗”，抑或“三农”。硕士论文的研究围绕乌托邦主义来讨论它的传统渊源。乌托邦是做梦的事，20世纪的中国曾见证过诸多伟大梦想的竞争，至今遗响未绝。到了全民争相“下海”的90年代，这种时代精神早已退潮，或遁为潜流。而我，却从一代代的去国者那里，发现了对这些潮流的不断追忆与反思——不仅仅出于个人命运的波折流离，更寓托着对国族板荡的忧惕警省。这其中，导师张灏先生的长期省思对我启发良深。在他的课上，对现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分析展现出了复杂的古今中西之维。我又从对宋儒的阅读中隐约把握到了这种精神气质的传统渊薮，于是围绕近世的《尚书》洪范学做了一番比较研究。

这个话题本来会成为进一步的博士论文主题，我却于其间产生了

很大的不安。要评判乌托邦主义的空幻、乖张，必须有一个论者自身确信的合理性根基。这一点，自觉当时的学识与思考力还不堪胜任。另外，这种源于现代问题意识的比较研究，如果缺少对于传统的内在深入探讨，很容易流于简单的批评和推断。对于儒家传统的初步探索，已经让我窥见内里的复杂性。于是我的学术精力，更多移向了传统自身的梳理。博士论文遂以南宋浙东学派的经制之学为对象，成为我迄今仍在扩展推进的一条研究主线。

儒家经世之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政治思想史关注的热点问题，张灏先生提出的三层义理架构说也成为此中典范。对入世取向、治道、治法的观察又可以上溯轴心文明期的思想突破，下贯转型时代的意识形态竞争。于此间，张先生提出的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二元权威、心灵秩序、政教关系等概念、论题，也不断激发我的思考。后继经制之学、洪范模式、实践意识、世俗性与公共性等问题写作，可以视为这个意义上的呼应与再思。此番过程，使我愈加意识到这类讨论其实触及的是儒家传统之宪制和秩序主题。传统秩序的宪制性（Constitutionality）逐渐成为激发我探索与反思的问题意识。

同时期，余英时先生晚年扛鼎之作的研究也成为有益的助缘。当时余先生对于朱子和宋儒的写作，通过他与张先生的远洋通话，使我得近水楼台之便，了解到诸如国是、皇极、内圣外王反思这些关键的信息。迨及大作面世，华人学界热议四起。余先生与港台新儒家的热烈争论无异是围绕传统与现代学术思想的一幕幕精彩活剧，而张先生居间持衡的中肯视角每每提醒我，尽可能从中汲取两造各自的优长。这也启发我更进一步地思考儒家传统的政治与道德关系，并从宪制构成的视角理解其中的精义与曲折。

博士毕业离开香港，我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任教。由于教学的缘故，一头闯进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园地，也让我

比较系统地完善了自身的知识结构，结识了一批活跃的西学研究者。没有对于西方传统的深入把握，中学研究的境地很难提升，这可能是当今中国学人面临的重大智识挑战。而怎样把中西研究的智慧与中国面临的转型难题结合起来，就更加考验我们的勇气、胸怀与眼力。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的探索惠我良多。其间，高全喜先生的政治宪法学、姚中秋先生的儒家宪政主义、许纪霖先生等师友关于自由主义与文明—国族的讨论，使我获益匪浅。可以说，之前从张灏、余英时两位先生那里汲取形成的宪制关怀在此获得了更为自觉的理论意识。

正是这些善缘的推动，启发我提出“宪制会话”的愿景。中国现代转型的宪制思考无疑是当今法政理论的核心议题。围绕宪制主题，我们需要在古今中西通汇的视野中来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特质与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可以被视作一个绵延不绝的会话过程，我们不仅参与到当下现实感极强的宪制对话，也需要时时造访先贤，去聆听他们的智慧之声。这种造访既是礼敬与述继，也包含了诠释学意义上的视界融合。

我们当看到，在关乎宪制的精神根基与治理模式上，中华文明的道统前定而不穷，蕴涵着开放竞争、生生不已的思想会话。而治体思考，则因世损益，体大精深，乃是维新不可离弃的基点。缘此，我围绕宪政儒学、儒家公民、道统自觉进行了初步阐发，将其视为范式创新的生机。没有道统的引导，理想主义难免陷于迷狂悖乱；没有治体的约束，乌托邦主义势必导致强制的灾难。而只有讲明道统、熟求治体，才能切实推进我们的秩序转型与国族建构。在此意义上，我愈发警惕笼罩现代中国至今的诸种意识形态心智（ideologue），而自认为一个保守传统的、审慎的宪政论者。这也是对治学伊始之乌托邦反思的一份解答吧。

当我赴港求学之际，大陆思想界继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的学术与思想之辨、人文精神讨论后，见证了立场阵营色彩强烈的分化和割据。这样的局面可以说贯穿了过去的十数年，似乎也将形成代际延续的窘相。清夜自扪，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胸怀与智慧避免 20 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激化与极化，避免党争恶政的劫难？这部分地取决于学人和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能力。一种开放的、努力超越意必固我的宪制会话，应当是一条值得推进与实践的出路。在中华文明经历百多年困厄颠蹶之后，它也许能透过对于秩序转型的深思熟虑，为我们提供损益复新的文明启示。

目 录

治道文丛 序

从乌托邦反思到宪制会话

经世与经制

经世精神与皇极观念：宋儒的洪范思想传统 /001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

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045

胡瑗与南宋儒学的实践意识 /079

投身实地：实践观的近世形态及其现代启示 /112

公论观念与政治世界 /126

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 /168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194

天人、治教与君子：《中庸》经义解析 /225

儒家与宪政

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 /237

期待开放的宪制会话：国族崛起下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253

正统论与中华文明的宪政时刻 /274

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现代认同问题的宪制视野 /280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300

保守我们的公共传统 /316

典范与统纪

政治思想史家的道与术 /323

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 /357

鸿飞那复计东西 /365

典范转移：《朱熹的历史世界》与儒家政治传统 /376

再造典范：现代性视野中的礼治论说 /397

法政人与传统的回转 /415

道统与公民

文明自觉与道统意识：自由主义的回归 /421

人民主权与儒家的公共精神 /429

宪政主义与革命主义 /440

意识形态激情、中道伦理与儒家公民 /447

穷途末路中的复新：中国文明与世俗化问题 /460

后 记 /477

经世精神与皇极观念： 宋儒的洪范思想传统

宋代儒学思想的经世特征，在现代学术界是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北宋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其以经世致用为薪向，易为学者识见。问题在于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南宋理学思潮与经世取向之间的关系，由于理学注重形而上学理论和内圣修身，而显得不甚明朗。学者们对此意见纷纭^①，最新的表现见于余英时先生的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之面世及其引起的一些讨论。^②可见这

① 根据张灏先生的观察，“近世中西学者从康南海、梁启超到钱穆、墨子刻，常常认为宋明儒学受佛老的影响，是以内圣或修身为其中心目标，因此经世精神衰退，外王志趣不张。”见氏著：《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2页。持近似观点的还有James,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6, epilogue. 另外一种观点，可见张灏的《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及其“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the Confucian Ideal of *Ching-shih* in Confucian Tradition”,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ed. By Tu Wei-m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张灏先生认为，经世是整个宋明儒学的中心思想，这个观念至少有三层意义：首先，它代表儒家所特有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即一种入世精神；其次，它通过政治以求化人世为一理想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把修身与经世结合为一，强调政治是人格的扩大。宋明儒学常用“治道”或“治体”指称这一层次；再次，相对于“治道”，用以实现之的客观规章制度为“治法”。

② 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该书主要论点是宋儒以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为其中心关怀和根本志向，理学家也莫不如此。通过重构南宋孝宗末年改革部署这一政治史上遗失的环节，对朱熹代表的理学家集团之政治志向进行了细致精深的发掘。政治经世是历代宋儒的根本追求。有关评论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总第七十九期，2003年10月。刘述先：《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学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一卷二期，第316—334页。

个问题实蕴涵丰富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拓开思考讨论的空间。

宋代经世思想与经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互动发展，相为推衍。研究者早已有所论及。^①具体来说，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五经中的《春秋》和《周礼》上。二者都成为宋代学者表达经世思想的主要经典文本，近年学者均有专著详论。^②本文认为，宋儒经世思想与其经学的密切关联还可以通过《尚书》中的《洪范》篇得窥机奥，它在《春秋》、《周礼》之外提供了观察经世思想的一个独特、重要的角度。

《洪范》是儒家经典《尚书》中的重要一章。它通过周灭商之后，武王访问商朝遗臣箕子、请教治国策略的形式，由箕子之口陈述了实现理想政治的九个范畴，即所谓“洪范九畴”。^③关于其作者及著成年代，学者意见纷纭，难有定论。^④自汉以来的儒家学者围绕此篇提出了许

① 如钱穆先生指出，由胡瑗和范仲淹奠定的宋学规模以经义为体、时务为用，正是经学和经世关系的一般表述。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章，《引论》。

② 有关《春秋》，宋鼎宗指出，“盖宋儒既志绍前圣，以尽《春秋》之薪传，又悲天悯人，以急时局之艰困。故其释经也，皆因时立义，假古讽今，要以经济时所为的，不以经生学士为已足。”见氏著：《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第一章，“导论”，第3页。有关《周礼》，吴万居认为，宋儒治《周礼》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藉经抒议，阐扬经世思想”，其中，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不仅成为新法改革的指导思想，又开宋儒义理学的先声，影响至深。见氏著：《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第三章。

③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引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卷12，《洪范第六》，第299页。

④ 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可参考范毓周：《“五行说”起源考论》一文，收入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张灏先生根据《大学》一书在理学中的关键地位，指出它所代表的人格本位政治观正是宋明儒学所谓的“治道”或“治体”，将政治视作人格的扩大。这是理学经世观念的精义。本文于四书之外，特别提出五经系统里的《洪范》，认为它对于我们了解宋儒经世思想的发展，可与《大学》相互补充。至于二者的交涉影响，后文虽有几处提及，实可另作专论探讨。

多精彩活泼的解释和议论，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重要角度。

由于文本以探讨治道为主题，论述政治的各个方面，极易和宋儒的经世追求相呼应^①。而且文本涉及的层面宏阔，天地人物靡不包涵既为喜好究心义理的宋儒们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又能容纳其他学术趋向的解释。这样就成了经世思想基线之上的公共话语平台，以其对宏观道德政治哲学的关注，引导着追求三代之道的思想目光。这个重要特征，再加上政治社会的大力宣扬，不断推动学者进行探索，蔚为两宋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本文主要利用这一时期经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相关文献，进行政治思想史的分析，希望借此揭示经世取向与宋儒思想之开展的一个重要面相，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据蒋秋华先生的研究^②，宋以前汉唐儒学的洪范思想基本上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论为理论根据，重视九畴中的第一畴“五行”，以五行统领其他八畴，集中讨论祥瑞灾异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相传为汉初伏生所著的《尚书大传》和《洪范五行传》里。刘向等人又将《洪范》与《春秋》参合，在前者表达的政治法则和后者记录的灾异祥瑞之间建立验证关系，进一步完备了《洪范五行传》的天人感应理论。刘歆认为八卦和《洪范》分别是谶纬学中所说的“河图洛书”；班固又以《洪范》中“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的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并且在《汉书·五行志》中辑录《洪范》经传，

① 张灏先生根据《大学》一书在理学中的关键地位，指出它所代表的人格本位政治观正是宋明儒学所谓的“治道”或“治体”，将政治视作人格的扩大。这是理学经世观念的精义。本文于四书之外，特别提出五经系统里的《洪范》，认为它对于我们了解宋儒经世思想的发展，可与《大学》相互补充。至于二者的交涉影响，后文虽有几处提及，实可另作专论探讨。

② 蒋秋华先生的《宋人洪范学》（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6）在此课题的研究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开拓性研究，本文受益匪浅，特此说明。

记载有关事应灾异，成为后世历代史书的典范。就政治思想的内涵而言，两汉大量的谏疏对策均引用《洪范五行传》的天人感应理论来评论君主的政治行为，以期警戒督导。只是学术演至末流，侈言灾祥吉凶，难免琐碎怪乱，反而损伤其政治功能。

汉以后，伪孔安国《古文尚书》及传和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在思想上仍然处于阴阳灾异和讖纬之学的范围。后者作为唐代到宋初的经学正统，在思想界发挥着主导性影响。^①

蒋秋华先生认为宋人论《洪范》可以分成四个主要方面：章句训诂、图书象数、疑经改经和贯通理学。^②本文主要就其中的义理之学探讨宋儒洪范思想的演变，尤其切重政治思想的考察。^③当然，图书象数之学中也包含着一套义理观念，比如邵雍、蔡元定父子有关《洪范》的一些作品。^④但其重心不在政治思想，与本文题旨稍远，暂不包括在内。

一、宋儒的洪范思想传统：经世精神的展现和演变

《洪范》在有宋一代受到的重视，上自帝王重臣，下及布衣士人。它是君主经筵讲习的重要内容，为君臣所熟论。例如宋仁宗曾御制《洪范政鉴》十二卷，以天变自我警戒，思想上虽然未出汉儒范围，却可见其重视程度。

① 蒋秋华先生指出汉儒对“皇极”的解释大体有三种：一是释“皇”为“王”，“极”有“法则”之义；一是“大中之道”；一是以“君”训“皇”，以“中”释“极”。宋儒基本上继承了汉儒规模，加以演绎。见氏著：《宋人洪范学》（同前页注②），第46页。

② 见蒋秋华著作，第一章第二节《宋代洪范学概况》，第16页。

③ 这里所指的“义理之学”，同于徐洪兴著：《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中对“理学”的广义理解，即有别于汉唐儒生治经所注重的章句训诂之学，旨在寻求儒经中蕴涵的大义和道理的学问。不仅仅指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还包括王安石、苏轼、浙东学者的学术思想。见上书第5页。下文所使用的“理学”一词，如无特殊说明，基本就其狭义而言。

④ 比如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蔡氏父子的《皇极经世指要》和《洪范皇极》通过一套宏大缜密的象数学体系来概括宇宙事理。可以参考侯外卢、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87）的有关章节。

在儒家士大夫阶层，对《洪范》的兴趣持续两宋三百年而不减。历代儒者或就其全篇、或择其精华阐述申论，其中著者，如宋初的张景、胡瑗、欧阳修、苏洵，之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两宋之际的张九成、范浚，南宋的林之奇、朱熹、陆九渊、唐仲友和叶适，包括了许多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新意迭出，大大超越了汉唐洪范学的范围，展示出义理上的共性特征，而且在长期演进中表现出一定的理路轨迹，在同一时期又具有思想上的多样化。

(一) 张景(970—1018)和胡瑗(993—1059)^①

宋初学者张景和胡瑗在思想史上标志着新学术的出现。^②这种新学术逐渐摆脱汉唐儒学的影响，开宋代学风的先河。他们二人流传下来的著作不多，巧合的是，有关《洪范》的论著在其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张景的《洪范论》已经佚失，不过我们可以在南宋林之奇的《尚书全解》中发现它的一些残篇，其中保留了张景的一些重要观念。^③李觏对他高度评价，“至于议论，则识精才健，无远不到。若《洪范》、《王霸》篇，笼络天人，锤锻古今，虽(柳)子厚好为论，尚未及也。”^④“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主要思想保留在弟子门人整理编纂的两部著作里，一是《周易口义》，一是《洪范口义》。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洪范》在宋初即受到一些重要儒者的重视。^⑤而此二人的洪范学论著，可以视为宋儒洪范思想传统的开山之作，它们不仅表达出宋学兴起的

① 张景，宋江陵府公安人，字晦之，少从柳开游，嗜学甚力。真宗诏有司征天下士，其名列第四。历任房州文学参军、昭信县令，后摄理真州事。

② 有关二人的学术地位，可参看石训等人合著：《中国宋代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五章第二节和第七章第五节。

③ 林之奇：《尚书全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四库全书本，第56册，该书卷24。

④ 《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21页。转引自石训等：《中国宋代哲学》，第120页。

⑤ “宋初三先生”的另外一位石介明确将《洪范》篇和《周礼》六官、《春秋》十二经、《孟子》七篇、韩愈的《原道》并列入他的王道书目里。见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7《读原道》。转引自《中国宋代哲学》，第165页。

思想讯息，也揭示有宋洪范思想的一些基本题旨。

在张景的《洪范论》中，汉唐儒学以天灾异象解释洪范的传统遭到猛烈抨击。张氏认为灾异乃是洪范思想的末节，政教才是真正的中心，其洪范思想由此表现出很强的政治理性主义取向。他指出，洪范九畴都是以人类经验知识能够把握的常道常理为内容，并非讲说非常怪异之论。所以经验理性应该代替神秘主义成为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依据，洪范的意义中心从天变笼罩下的消极回应转移到相对独立的政事领域上来。具体表现在，活跃于灾异论里的“天”所代表的外在超越角色被降低到非常微弱的位置，^①而王者作为政教主体，其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比如张景认为第九畴福极并非如传统注疏所言，^②由天掌握其权，而是同五行之外的其他畴类一样，属于君主政教的施行范围。对福极的内容以政教得失和社会生活的优劣来作相对的解释，剔除了汉唐注疏里天命论的痕迹。比如民舒泰则各尽其寿，乐业则各得其富，不死于征战、不陷于刑辟所以考终命。^③

另外，张景在文中还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相信由遵循九畴而达成的彝伦攸叙，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入至治之世，否则，彝伦攸教，文明将堕入至乱之世。这种信念，长期持续而强烈地存在于宋代洪范学的思想话语之中，往往凝聚成一种以经世为标帜的乌托邦精神，

①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的超越问题，可以参看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收入《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文章指出了儒家人文思想具有超越意识的前提，这种意识主要反映在儒家的天人之际思想里，表现为天人相应和天人合一两种形式；“天”的内涵，按照冯友兰的区分，基本上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见氏著：《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第三章“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第55页。从超越存在的角度看，作为主宰和掌握命运的“天”属于外在超越，义理之天代表的宇宙规律在宋儒思想里突出地以内化超越的形式出现，即人可以通过认识天理、修养道德与天达到契合。廖名春、陈明：《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00页。

② 廖名春、陈明：《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00页。

③ 同上注，第323页。注疏中“寿”为百二十年，“富”为财丰备，“考终命”为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